

京津冀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沈映春,王逸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从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互动视角出发,运用改良后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率和常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率受户籍政策影响较多,常住人口规模对区域内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发展具备经济收敛特征,同时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区域内人口的合理流动。因此,应从人口与产业互动出发,实施差异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并搭建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口流动顺畅通道。

关键词: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户籍政策;经济收敛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685(2019)05-0094-08

DOI: 10.16528/j.cnki.22-1054/f.201905094

我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便将京津冀地区作为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人口布局的“四大”试点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已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和研究价值。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 2018》显示,近年来京津冀人口流动速度仍稳步上升。区域发展会促进人口有序流动,人口流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也会产生深刻影响。关注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探究该区域内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收敛状态,有助于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体制和机制创新,并有利于探求以京津冀为代表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所引发的“大城市病”问题的解决之道,对我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新古典模型中的经济收敛是关于某地区人均 GDP 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假设,其主要指两个 GDP 相差较大的地区,最终经济发展会趋于同样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发展速度会相对快一些。而条件收敛则是对绝对收敛的补充,指在投资率和储蓄率及人口增长等特征相同的地区,经济增长路径会趋同,地区的人均 GDP 也会趋于相同。对经济收敛的实证测量起始于巴罗(Barro)等对州际之间的增长稳态率和稳态产量水平之间差异的研究,其研究结论为美国州际的人口迁移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收敛产生影响。^[1]同时,巴罗等将此模型排除人口流动的内生性后,对日本与德国的相关社会效应进行了验证。^[2]威廉姆森(Williamson)进一步引入人口回迁率、有效劳动比等参数,发现大规模移民对接纳移民国家的人均 GDP 贡献率达 50%,进而推断人口迁移率对经济收敛存在显著影响。^[3]近年来,由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快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国内学者对城市群和全国层面人口流动与经

作者简介:沈映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逸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济收敛的作用问题更为重视。国内学者从经济收敛理论的不同切入点及不同研究方法出发,对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收敛问题进行探讨。如侯燕飞和陈仲常从人均产出的数理方法入手,推演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4]张传勇将劳动力流动与房价上涨作为因果,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收敛效果进行分析;^[5]黄乾和李修彪以人力资本的流动作为探究对象,从区域内人力资本运行效率探究经济收敛问题;^[6]蔡阳以工资率为切入点,结合人口迁移,对我国各省份经济收敛情况进行分析;^[7]何天祥和陈晓红间接从空间外部性出发,通过赋予空间地理权重对迁移等要素进行探究;^[8]孙向伟和陈斐基于空间拓展的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通过改善大尺度观测单元可能存在的问题,采用小尺度观测单元结合劳动人口增长率等因素,对我国339个地市进行区域经济收敛性分析。^[9]整体看,国外学者对于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收敛性的探讨更多集中在理论发端的验证方面,而国内学者对经济收敛性的研究,在模型内容层面存在诸多角度扩充,方法层面也趋向于动态的新兴空间研究,但较少单独基于城市群进行人口流动层面的研究。随着国家从战略层面对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日益重视,探究人口流动对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收敛效果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基于此,本文采用Barro模型及其衍生模型,基于京津冀地区2005—2017年数据,探究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对该区域内部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口分布现状

2005—2017年,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水平大幅提高,且增速均较为稳健。从GDP总值看,河北省GDP最高,北京市次之,天津市最低。从时间维度看,2010—2014年河北省经济增速有小幅波动,2014年后经济增速趋于稳定。2014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强调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的重要性。此时实现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主要着力点已经清晰明确,河北省经济增速受此影响有所增加。天津市在2016年后经济增速存在放缓趋势,但2016年天津市被确定为一线城市后,其经济结构日趋改善。北京市近年来经济增速则保持平稳态势。

在京津冀人口流动方面,采用侯燕飞等^[10]对人口流动的测量方法,通过人口流动率刻画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状态。依据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指标获取这一数据,即人口流动率(Flow) = (常住人口 - 户籍人口) / 户籍人口。京津冀三地在2005—2017的13年间,人口流动率数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即三地均存在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的现象,且此现象整体愈加明显。北京市的人口流动率最高,河北省的人口流动率最低。具体看,北京市由于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加强了对人口流动的管理力度,人口流动率明显降低。天津市在2014年后人口流动率呈微弱下降趋势,这与2014年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报告中天津的政策部分相关,即协同发展后,劳动力有更便捷的条件向北京等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转移。同时,2014年下半年,天津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在北京进行实地考察,围绕产业转移与交通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这与上述政府发展规划带来的影响趋同,即天津市2014年后人口流动率的微弱下降受到战略层面的影响。河北省在这13年间的人口流动率趋势较为特殊,即2014年与2015年这两年间,河北省的人口流动率呈现较明显的负值,常住人口低于户籍人口,人口向外流失情况十分严重。

三、数据处理与模型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相关数据。其中,由于各省市的流动人口数量缺乏官方统计数据,本文继续采用侯燕飞等^[11]的方法。该方法相比单纯以农村人口作为主要流动人口的统计办法效果更为显著,也更能反映实际的人口流动状况。同时,其经济意义较为明确:人口流动率数值为正,则表示该地区主要以人口流入为主;人口流动率数值为负,则表示该地区主要以人口流出为主;人口流动率为零,则表示该地区在该时段内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数量基本持平。而且该模型在数量上较难产生分歧。由于我国

常住人口统计从 2005 年开始,所以本文数据的起始年份也是 2005 年,并截止至 2017 年。经济增长率 (g) 用该地区前一年的 GDP 数值与当年 GDP 数值之差占当年 GDP 数据的比重衡量。人口规模 (n) 用该地区当年常住人口的数值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率 (i) 用该地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占该地区当年 GDP 的比重衡量。城乡储蓄率 (s) 用该地区当年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占该地区当年 GDP 的比重衡量。全员劳动生产率 (l) = [(第一产业的增加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从业人员)]/3。人均社会保障 (b) 以该地区当年社会保障支出金额除以该地区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衡量。其余各指标均直接来自相关年鉴。本文对各项指标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未通过平稳性检验的地区指标数值在回归时进行一阶差分后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二) 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 Barro 等^[12]提出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并借鉴李晓阳等^[13]对该模型的改进方法。由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惯性,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的指标并不一定都在当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中得到体现,所以在人口流动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幅度及经济增长收敛影响分析时,引入经济增长滞后解释变量。由于各地区均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所以取滞后变量值为 1。以 2005—2017 年的历年数据作为观测值,估计多变量线性回归方程的各项解释变量参数。含有经济增长滞后解释变量的模型为:

$$\ln y_{i,t} = C + a \ln y_{i,t-T} + X_{i,t} \beta + \varepsilon_{i,t} \tag{1}$$

根据新古典模型中经济收敛的内涵,将公式 (1) 变形为:

$$\ln y_{i,t} = C + e^{-\theta T} \ln y_{i,t-T} + X_{i,t} \beta + \varepsilon_{i,t} \tag{2}$$

其中 $y_{i,t}$ 为 i 区域第 t 年的人均 GDP,单位为万元/人; $y_{i,t-T}$ 为 i 区域在间隔期 T 年前的人均 GDP,单位为万元/人; θ 为人均 GDP 的收敛速度; $X_{i,t}$ 为 i 区域在 t 年的其他变量,如人口流动率、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率、城乡储蓄率等; β 为回归系数; C 为常数项; $\varepsilon_{i,t}$ 为独立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对京津冀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即人口流动是否会对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三是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一)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用多变量线性回归方程,分析人口流动因素对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的人均 GDP 的影响,分析方程为:

$$\ln y_{i,t} = C + \beta_1 \ln y_{i,t-T} + \beta_2 \text{Flow}_{i,t} + \beta_3 \ln n_{i,t} + \beta_4 \ln i_{i,t} + \beta_5 \ln s_{i,t} + \varepsilon_{i,t} \tag{3}$$

为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经济增长滞后变量 ($y_{i,t-T}$)、人口规模 (n)、固定资产投资率 (i) 及城乡储蓄率 (s) 进行取对数处理。同时,在此部分涉及的变量中,北京市人口流动率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通过平稳性检验,河北省的城乡储蓄率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对北京地区人口流动率的解释将采用人口流动率趋势的经济意义,对河北省城乡储蓄率的解释将采用城乡储蓄率趋势的经济意义。本部分其余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1。

表 1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变量	京津冀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常数	8.307 (1.748)	-1.073* (-3.553)	3.169* (14.304)	-19.590* (-8.482)
上一年经济增长	0.841* (19.102)	0.672* (3.087)	0.415* (16.983)	0.839* (10.644)
人口流动率	1.003* (7.633)	-0.040 (-0.566)	1.832* (32.771)	-0.217* (-5.758)

续表 1

变量	京津冀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常住人口规模	0.031* (-4.932)	0.331* (3.578)	0.063* (2.931)	2.736* (6.719)
固定资产投资率	0.104 (0.148)	0.327* (-8.462)	0.212* (6.447)	-0.462* (-3.955)
城乡储蓄率	-0.225* (-3.849)	-0.027* (-3.553)	-0.057* (-15.910)	-0.158* (4.290)
R ²	0.998	0.886	0.993	0.997
Adjusted R ²	0.997	0.845	0.988	0.994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表示在 5% 水平下显著。

1. 从人口流动率看, 人口流动对京津冀整体区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且人口流动尤其有助于天津市的经济发展。京津冀区域整体政策机制不断创新带动人才数量的增加, 有利于满足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而天津市作为承接产业转移地区, 在产业转移与对接的链条中加大技术要素投入, 动态的人才流动正符合天津市依照政策战略, 定位于做强高技术产业的产业链条延伸角色。人口流动与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即过多的人口流入与流出并不会对河北省的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4)》明确指出, 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应合作开展支持冀中南地区、张承地区绿色转型发展。也就是说, 河北省应主要依靠内部结构优化发展, 并在京津冀资源共享的构架下, 利用其综合协调平台作用提升竞争力。对于北京市, 人口流动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北京市当下疏解非首都功能并建立城市副中心, 也侧面印证了合理控制流动人口数量的必要性。

2. 从人口规模看, 京津冀区域整体的人口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 这与京津冀区域当前常住人口规模过大相关。从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三地看, 人口规模的增长对三地经济发展均存在促进作用。其中, 河北省人口规模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即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助于河北省进一步发展、实现优化升级。

3. 从固定资产投资率看, 固定资产投资率对京津冀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但对河北省呈抑制作用。这主要源于河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存在滞后效应。^[14]

4. 城乡储蓄率对京津冀区域整体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储蓄率增加时,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投资市场份额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从而间接影响当地经济增长。

(二)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根据公式(3)建立经济增长收敛方程:

$$\ln g_{i,t} = C + \beta_1 \ln y_{i,t-T} + \beta_2 \text{Flow}_{i,t} + \beta_3 \ln n_{i,t} + \beta_4 \ln i_{i,t} + \beta_5 \ln 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为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对经济增长滞后变量($y_{i,t-T}$)、人口规模(n)、固定资产投资率(i)及城乡储蓄率(s)进行取对数处理。同时, 在此部分涉及的变量中, 北京市人口流动率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通过平稳性检验, 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增长率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通过平稳性检验, 河北省的城乡储蓄率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 对北京市人口流动率的解释、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增长率的解释及对河北省城乡储蓄率的解释, 将分别采用人口流动率趋势、经济增长率趋势及城乡储蓄率增长趋势这三种经济意义。本部分其余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速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京津冀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常数	-9.393* (-26.194)	8.137* (-4.003)	-2.831* (-3.077)	17.602 (1.939)

续表 2

变量	京津冀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上一年经济增长	-0.075* (3.087)	-0.079 (-0.399)	-0.042* (2.724)	-0.031* (14.343)
人口流动率	-5.348* (-8.755)	-13.829* (-2.602)	-9.796* (-4.954)	3.243* (19.305)
常住人口规模	1.012* (29.965)	0.374 (0.089)	0.976 (1.082)	-1.548* (-3.887)
固定资产投资率	0.208* (-5.116)	0.204 (0.0489)	0.397 (-1.630)	0.760* (0.298)
城乡储蓄率	-0.503* (2.998)	-0.409* (-6.559)	-0.428 (1.670)	-0.751* (-5.899)
R ²	0.932	0.893	0.969	0.996
Adjusted R ²	0.929	0.821	0.947	0.987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表示在 5% 水平下显著。

1.从人口流动率看,京津冀区域整体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即更活跃的人口流动状态不利于京津冀整体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与提升。由于本文针对人口流动率的测量采用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户籍人口]定义,因而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也可作为分析的一个突破点。在京津冀地区,非户籍人口由于数量众多且无法得到身份认同,从长期看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抑制作用。如何合理规划户籍人口数量及该区域内流动劳动力的数量,使二者形成良性结构,是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同理,北京市人口流动率也与其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北京市户籍发放数量的增长趋势(户籍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北京市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影响。对于天津市与河北省,人口流动率与两地经济增长速度也呈负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弱于北京市。

2.从人口规模看,京津冀区域常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促进作用,河北省常住人口规模则对其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抑制作用。这进一步凸显了关注人口规模内部结构的必要性:当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由于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对内部结构优化的要求,不合理的常住人口规模不利于经济的稳健增长;当研究经济增长速度时,良性的常住人口规模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上升。

3.从固定资产投资率看,固定资产投资率对京津冀整体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促进作用,对河北省经济增长速度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18)》显示,在产业投资方面,2012—2016年京冀两地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和联合专利授权量最多,占京津冀总量的五成左右。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河北省借助北京市一些高质量的资源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率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正向、良性发展。

4.从城乡储蓄率看,城乡储蓄率对京津冀整体及三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均产生抑制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提升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但过高的城乡储蓄率会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而城乡储蓄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抑制效应,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三) 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为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建立人均GDP与人口流动的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方程如下:

$$Flow_{i,t} = C + \beta_1 \ln y_{i,t} + \beta_2 \ln l_{i,t} + \beta_3 \ln u_{i,t} + \beta_4 \ln b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为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部分对经济增长变量($y_{i,t}$)、全员劳动生产率(l)、失业人数(u)及人均社会保障支出(b)进行取对数处理。同时,在此部分涉及的变量中,天津市与河北省的失业人数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通过平稳性检验,京津冀整体区域与三地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对天津市失业人数与河北省失业人数的解释,京津冀整体区域与三地人均社会

保障支出的解释,将分别采用失业人数增长率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这两种经济意义。本部分其余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动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京津冀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常数	-4.493 (1.515)	-5.275* (4.575)	-3.409 (-1.220)	-1.161* (6.117)
经济增长	0.588* (4.8232)	0.359* (-2.172)	0.284 (1.088)	0.301* (8.864)
全员劳动生产率	0.042 (-2.295)	0.293* (4.406)	0.163* (0.355)	0.013* (-2.199)
失业人数	-0.582* (-4.523)	-0.143* (-18.444)	-0.039 (-0.416)	-0.238* (-3.157)
人均社保	0.009* (-10.997)	0.003* (-6.895)	0.011 (-1.448)	0.001* (-2.354)
R ²	0.993	0.993	0.980	0.998
Adjusted R ²	0.988	0.987	0.971	0.998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

1.从京津冀区域整体看,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动具有促进作用,这与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原因与趋势相契合,即劳动力更多向经济条件更发达的地区集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京津冀协同治理中,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于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即不仅为创新要素的供给与需求搭建桥梁和互通机制,同时针对创新主体构建交流机制,以形成京津冀城市群内部有序的人口流动格局。全员劳动生产率对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也具有促进作用,即合理的劳动组织结构与较高的组织管理水平有利于吸引人才向京津冀地区流入,进一步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失业人数与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较高的失业水平会抑制更多人口流入的意愿。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存在一定正向作用,侧面印证了对社会保障的期望已成为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之一。

2.从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三地来看,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动皆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北京市与河北省促进作用在5%水平下显著。全员劳动生产率对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人口流动具有较大促进作用,但对河北省的促进作用有限。失业人数对北京市人口流动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对天津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河北省影响较大。这也侧面印证了京津冀协同战略下,天津市“对接京津冀、辐射京津冀和示范京津冀”的作用。此外,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对三地人口流动均有微弱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依据人口流动率的计算方法,非户籍劳动力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及增速具有较强影响。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2018》,京津冀最大的人口流入地北京,2017年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数值双下降,相应的常住人口也在下降。同时,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京津冀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下降趋势,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五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比例从2012年的70%下降到2017年的52%。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京津冀区域内的落户意愿一直保持稳定。京津冀区域内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落户意愿的背离,是京津冀区域内人口流动率的一种复杂体现,其在短期内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从长期看,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不稳定户籍的流动人口对区域经济良性发展会构成一定挑战。常住人口规模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增速的影响,则应主要从京津冀内部构成及不同地区所承担的角色加以分析。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的常住人口规模各自有利于三地经济发展,对河北省作用尤其显著。将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常住人口进行合理测量与动态规划,以形成适宜的人口规模结构,对于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河北省常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具

有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河北省应进一步在基于共享资源的创新发展中,探求自身发展的优势和潜力,谋求经济增长的稳健状态与高质量长远发展并存的新机制。此外,经济增长及部分相关社会经济指标对人口流动也存在影响。全员劳动生产率对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失业人数则起到抑制作用,符合现实和理论逻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对京津冀区域整体及三地的经济发展均存在正向作用,所以统筹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构建公共服务同城化体系,有利于增强城市群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目前,京津冀区域内社会保障政策“互联互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8年,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三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河北雄安签署《京津冀工伤保险工作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三地的工伤保险已实现互认。这一政策的出台体现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中社会保障的统筹发展趋势。

(二) 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存在重要联系。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都市圈的顶层设计——《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指出,针对我国都市圈的发展,应坚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顺势而为”。具体而言,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30%,这个国家的人口、资金等开始不断向城市集聚,此时城市人口会进入普涨期;而当城市化率超过50%,人口与产业等开始向大城市集聚,城市化进入相应的大城市化阶段,也称都市圈化时代。根据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9.58%,人口流动已进入都市圈化时代,尊重市场规律与经济发展逻辑建设城市群和都市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 实施差异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城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的同城化累计互认。”这对于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具有三层内涵:一是虽对特大城市仍有落户限制,但环京圈城市仍存在激发城市间人口流动与城市间“抢人大战”的可能。二是户籍准入年限的同城化累计互认,对于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具有疏解作用。三是人力资源信息共享的户籍准入,更强调给予人才以发展空间,从而也给区域内产业的更深层次转移承接与优势互补提供了保障。三层内涵形成递进趋势,由单项的户籍指标过渡至环京地带的生存态势,落脚于基于户籍对人才的分区调控。可见,差异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既符合当前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发展高科技产业与人才流动的需要,也是实现人口分布与产业布局协同优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应结合京津冀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产业转移承接、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从人口与产业双向互动出发,探索基于地理区位和功能规划的差异化户籍制度,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化。

2. 搭建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口流动顺畅通道。产业转移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而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利于营造更适宜人口流动的环境。以都市圈的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为例,大力发展并完善城际铁路网络,充分利用普速铁路和高速铁路等服务,既有利于提升既有产业的生产效率,也有利于流动人口的通勤需求。目前,北京市串联燕郊与市区的地铁平谷线已筹备规划,未来环京南部区域将以平谷线为模版,建设更多的进京地铁。因此,应加大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搭建人口流动的顺畅通道,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合理人口流动秩序的形成及相关战略规划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12] Robert J Barro,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J].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1990.
- [2] Barro RJ, Sala-i-Martin X. C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Regions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1(1): 107-182.
- [3] Williamson J G.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J].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8.
- [4][10][11] 侯燕飞, 陈仲常. 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9): 11-19.

- [5]张传勇.劳动力流动、房价上涨与城市经济收敛——长三角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6(3):82-90.
- [6]黄 乾,李修彪.我国省域人力资本的收敛性分析——基于三种测算方法的比较[J].人口与经济,2015(4):94-106.
- [7]蔡 阳.我国人口迁移和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23):138-141.
- [8]何天祥,陈晓红.动态外部性与城市群经济增长收敛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7(11):2791-2801.
- [9]孙向伟,陈 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视角——来自空间扩展的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的证据[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31-38.
- [13]李晓阳,林恬竹,张 琦.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互动研究——来自重庆市的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15(6):46-55+127.
- [14]李 博.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效果及滞后效应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48-51.

(责任编辑:杜 磊)

Effect Analysis and Policy Suggestion on Population Flow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Shen Ying-chun , Wang Yi-q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Beiha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 this paper uses the improved neoclassical economic model proposed by Robert J. Barro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flow rate and resident population siz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growth rate in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reg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pulation flow rate in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region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cy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ontrol , and the size of resident population has more consideration on the benign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in the region , and the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At the same time , economic growth has changed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movements within the region. Finally , it is suggested to take the form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interaction as the improvement path to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f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circle layer , and to guarantee the smoothness of population flow in two direction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industries.

Keywords: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Region; Population Mobilit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licy; Economic Convergence